

经济学不止关乎心智,还有心灵

■ 鹿溪



我们需要一种“更美好、更理智”的经济学。

视觉中国供图



《好的经济学: 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
[美]阿比吉特·班纳吉
[法]埃斯特·迪弗洛 著
张缘 蒋宗强 译
中信出版集团

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或许正如两位作者一再强调的那样,“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但不同经济学家间不同思想和理论的碰撞,在所难免。

例如,作者在致谢中提到的哈佛大学历史与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艾玛·罗斯柴尔德教授曾指出,亚当·斯密相信大多数人会希望其他人同样不受压迫或剥削,“这是经济自由体系的基础”。可惜的是,两位作者只看到了古典经济思想不能完全切合现实的重大缺陷,却未能看到其最为虔诚的愿望。作者们致谢的另一位学界同好、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在新书《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中也提出,不平等的真正原因来自政治与意识形态,有可能通过“参与式的社会主义”以及递进税率解决。但两位作者认为对超级富豪课征重税,也不能募集到超过美国国民收入1%的资金。那么在面对书中提出的移民、贸易战、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时,社会政策的创新所需资金从何而来?两位作者对此并未提出可操作的具体方案。

经济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一名接受过10年经济学科班训练的普通读者,我曾认为经济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认识或许过于诗意、缺少地气。因为真实世界的经济绝不像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那样是稳定的、理性的,有效率的,甚至不应该将该经济学视为一门纯粹的科学。但我也曾思考,接受过最基本的经济学教育的人之间,是否存在一系列衔接、保守、认同的基本原则,例如关注选择,重视合作,支持交换。

欣慰的是,我们总能发现,无论所提出的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问题假说、实证模型、推演路径、学理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何大相径庭,有坚守的、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无不是希望能得出符合科学精神、令人信服且有助于“经邦济世”的结论,让我们离真相更近一步,其目标和理想其实都是让市场更有效率、更显公平、更具道德,也就是两位作者所说的“经济学家们条件反射式的基本观点”:“我们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同时为那些弱势群体提供保障。”

正因如此,两位作者才指出,“我们都想要一个更美好、更理智的世界。”或许我们同样需要一种“更美好、更理智”的经济学,即:一种认识到人类的最终目标不是GDP数字,而是福祉提升的经济学;一种认识到马歇尔所提出的“人的研究”意义上的经济学;一种愿意保持谦虚和诚实、实事求是地接受检验并不断保持发展活力的经济学。

最重要的是,用罗纳德·科斯的的话来说,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个开放式的集体学习与自我转型的演变过程,任何思想与知识都不可能完美、终极、单一到足以一统天下地描绘多维度、多面向的现实。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如果不能真正信奉知识的自由竞争,任何国家与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无疑都是不可持续的,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会毫不犹豫地赞同这点。

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经济学常伴左右。

当下,各国都或多或少面临移民、收入差距、全球化困局、技术颠覆、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加速等问题,面对这些挑战,经济学该如何回应?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作者、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和法国学者埃斯特·迪弗洛,在合著的《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以下简称《好的经济学》)一书中,试图给出解决方案。他以明晰优雅的笔触阐述了经济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提出了诸多富有创新和启发性的建议,以令人信服的理由阐释了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明智之举,以应对经济增长、移民、贫困等迫切挑战。

为什么对经济学家失去信任

2019年10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的“夫妻档”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与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个月后,班纳吉和迪弗洛出版了《好的经济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一书。他们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普通民众大多已失去了对经济学家们的信任。2017年初英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就自己的专业领域发表言论时”,护士排在第一位,获得84%的民众信任度;政客的民众信任度垫底,得票率只有5%;而经济学家排名倒数第二。两位作者2018年对1万名美国人做了同样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政客的得票率比英国更低,而相信经济学家的人只有25%。

造成信任危机的一个原因,是那些顶着“经济学家”名头经常在媒体公开发表言论的人,“本质上都是其所在机构经济利益的代言人,经常随意忽略证据的重要性……更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对市场做出乐观主义预测”。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真正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很少花时间解释自己结论背后通常极为复杂的推理论证过程。

普通民众大多以经济学家能否做出准确的估计和预测,作为自己能否信任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主要根据,但问题恰恰是“预测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经济学家》杂志曾计算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团队”在2000年至2014年间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发现“基本上他们的预测从来没有成功过”,其平均预测误差为2.8个百分点,也就

是说“比每年随便从-2%到10%之间挑出一个数字只稍微准确一点”。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的研究与结论似乎不食人间烟火。曾有一项研究邀请经济学家和1000名普通美国人回答20个相同的问题,如是否加税,如何评价美国政府在2008年危机之后采取的经济救助政策,如何看待大公司首席执行官高薪资水平,结果发现对某一问题持肯定态度的经济学家的比例和持同样态度的普通美国人的比例相差35个百分点之多,这无疑反映出“典型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和普通美国人的思考方式存在巨大差异”,也最终导致“很大一部分公众已经彻底拒绝听取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的观点”。

更有尊严的增长和发展

在9年前出版的《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中,两位作者采用了细致的实地调查与随机对照的实验方法,集中分析和讨论了穷人面对的环境、约束、困境、动机、激励及选择,包括他们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的脆弱与疑虑,对社会网络的依赖与笃信,在获取信息渠道、学习知识文化、参与银行存贷款活动及购买保险防灾防祸等利用正式制度与正式市场方面和中产阶级相比所承受的无法逾越、难以负担的“交易成本”,以及他们在自

发秩序下发展出来的非正式制度和生存智慧,等等。

而在《好的经济学》中,两位作者将议题进一步扩展到移民问题、收入差距、全球化困局、技术颠覆、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加速等方面,试图引入更为精致、精心、精密的政府干预,以外部激励结合说服引导,来推进扶贫、卫生、教育、金融等事业的发展。作者们在书中反复强调,不能让经济学成为纯粹书斋式的学问,不能过于理想化地假设市场自己能创造公正的、可接受的、高效的结果,这是因为“在一个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赢者通吃的世界里,穷人和富人的生活正在产生巨大差异,如果我们把所有社会问题甩给市场,这种差异将无法逆转”。

更微妙的是,两位作者发现,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和他们研究发展中国家面对的问题是相似的——“人民无法享受发展成果,社会不平等极速加剧,对政府缺乏信心,碎片化的社会和政治”,而这无疑会导致“我们所熟知的、建立在民主和对话基础上的文明正受到威胁”“受干旱影响的印度农民、芝加哥南区的年轻人和刚被解雇的50多岁白人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可能面临问题,但他们本身不是问题”。

经济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多次指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其实是政治经济学,并且是比“财富”更重要的“人学”的一个

方面,经济学不应只研究人的心智(mind),还应当研究人的心灵(heart)。这种定义与已经过度专业化、零碎化、细密化、局部化了的当代经济学的观点截然不同,但我认为,它与两位作者在书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

可以说,要理解经济议题,就要理解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各自的生命历程、生活世界、生活场景,同时又要采用田野调查、随机试验等科学手段来寻找制定和改善政策建议的科学依据,借以在金钱和物质之外,“将人的尊严重新放在中心位置”,并在这个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带来分裂与对立的时代,帮助我们消弭分歧、重建互信、打造共识。

构建更人道的经济学

凡在谈及经济学改变世界的力量时,论者大多会引用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的经典之论:“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深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之前的某个学人。”

本书两位作者也未能免俗。但奇怪的是,他们并未引用凯恩斯在《通论》中最后的话:“早些

穿越世界,访得教育“真经”

■ 洪平

疫情之下,要不要出国留学成为一道讨论题,其实,这道题的核心指向是:我们到底想要怎样的教育。

《穿越世界的教育寻访》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周成刚的新著,这位自己曾出国留学,也曾执教于大学,后又做过新闻记者的教育领域创业者,在过去十多年里,上百次带团走访世界各地的大学,与校长、教授们展开对话,他对世界教育的观察,深于一般人的走马观花。

周成刚还是位摄影爱好者,除了文字,他同时还用镜头记录寻访所得,而他的镜头所记录的,往往是大学校园中一些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不同于一些留学机构出版的介绍海外名校的图书,《穿越世界的教育寻访》更像是一本研究教育的学术著作。书中不是对一些名校做浮光掠影的介绍,而是作者根据自己对教育的观察角度,选择描述的学校和描述的内容。所以,书中不少学校并非国人关注的热点,比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间人体解剖室”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这所大学建于1088年,900多年来从未停止过运转,是世界公认的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者但丁和彼特拉克,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的伽利略、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代表人物伊拉斯谟,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等,都曾在这所大学里学习或执过教。作者重点介绍了大楼里的一间解剖室——世界上第一间解剖室。今天它成了一个展厅,而在历史上,曾经在这里进行的解剖实验,奠定了当代医学的基础。解剖室的建立,既是一场知识的探索之旅,更是一场冲破中世纪黑暗的战斗历程。

对知识的探索和对名利的追逐,此消彼长,很难共存。一所大学呈现怎样的面貌,在于它继承了怎样的传统。作者在书中讲了自己的一件趣事:他带队探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把车停在了整整齐齐空着的一排停车位上,却在离开时发现,这一排车位是本校获诺贝尔奖的教授专属停车位。作者慌忙撤退,却也心存好奇:第一,该校真有这么多诺奖得主吗?那么,除了车位,学校还会奖励诺奖得主什么呢?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公开可查的,而第二个问题,作者在之后的采访中了解到,拿了诺奖,教授们得到的唯一奖励,就是车位,不会升官,也不会发财。这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在伯克利分校,学校管理层没有

觉得不妥,社会对此也没有异议,教授得到车位也很欣然。何也?因为大家都把探索知识所获得的智识上的愉悦视为对探索本身的最好奖励。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反例,说国内有位2017年才当选的院士,居然以“跑马圈地”的紧迫感和“只争朝夕”的速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院士工作站和院士工作室共88家,有时候一天挂牌两个工作室。我不知道作者指的是谁,但或许具体是谁并不重要,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不同价值导向会带来怎样不同的教育氛围。

得了诺奖却没有物质奖励,不代表教授们的体面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因为体面既需要合理的薪水,更是对教授人格和自由表达的尊重。二战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受邀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在欢迎大会上致辞时表示,对于有机会会见诺贝尔大学全体“雇员”而感到万分荣幸。诺贝尔奖得主伊西多·艾文克·拉比教授站起来打断他:“先生,教授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除了大学传统精神,作者还关注了大学在开展艺术教育和培养体育精神上的作为,看到了这些做法背后的理念——“科学家像艺术家一样追求美,是科学取得创新性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赛艇运动的背后是大学对“和谐、平衡与节奏”的人生态度的鼓励。

这本书,适合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读一读,也适合陷入教育焦虑中的家长读一读。围绕要不要留学的讨论,忽略了问题的本质:关键在于选择在哪里接受教育,而在于你如何理解教育、你对教育赋予何种期待。

1921年,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爱因斯坦首次访问美国。当他在波士顿接受媒体采访时,有记者故意问他在哪里的速度是多少。爱因斯坦拒绝回答,说在任何一本物理学教科书上都能找到的答案,没有必要非得记住,并说:“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学习了多少事实,而在于训练大脑思考。”如果你不懂得大学教育真正的价值,那么,去哪里留学,都取不回真经。

《穿越世界的教育寻访》周成刚 著 新星出版社

每个手艺人,都有一个故事

■ 钟志勤

根植于足下的泥土,又散发着清雅的芳香。用这句话来形容《念物记·扬州手艺人》再合适不过。扬州女作家梅静,对脚下的土地拥有天然的熟悉之情,她从小巷深处、乡野之间的传统手艺人,一一梳理整收,捧到读者面前。

这本书的本质是朴素的。二十三项传统手艺人,每一项都来自民间,出自粗糙的双手。透过文字,仿佛能触摸到器物的肌理,聆听到手艺人的呼吸。

这本书的姿态是优雅的。精巧的结构、细腻的文字、真挚的情感,让读者轻松而愉悦、感动而温暖。

历史上的扬州,灵秀富庶,文脉丰厚,对精致生活和风雅时尚的追求,催生了繁盛的工商业,精湛技艺在隋唐时即颇负美誉,至清代,“凡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广陵,盖如百工之居肆焉”,扬州手艺人更是名扬天下。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扬州和世界许多城市一样,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工业化生产的大潮冲击。那么,扬州手艺人,现在还好吗?

从2015年至2019年,梅静用整整四年的时间,探寻着扬州手艺人的一生。起初,她是应一家杂志之邀,撰写一篇有关扬州古籍版片保护的文章。正是那次采访写作,让她得以了解“雕版印刷”这一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技艺,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古籍版片在扬州所经历的劫后重生,还有那些在喧哗尘世中寂寞坚守的刻印艺人。

她被深深打动了。有感情的文字总是容易引起共鸣的,《素笺不言,雕文有声》一文发表后,许多读者与她联系,称这篇文章写出了传统技艺的价值,写活了手艺人,并鼓励她继续写下去。从此,梅静开始了扬州手艺人专题写作。

《念物记·扬州手艺人》这部作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组对立而又统一的词:小与大,暖与冷,一方与天下。

小视角与大情怀,这本书没有空谈宏大主题,也没有板着脸孔布道,而是用二十三个篇章,每篇讲述一项扬州传统手艺人,刻画一位或数位代表人物,这些手艺人,有的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比如雕版印刷、剪纸;有的至今没有什么“名头”,比如盘扣、手工布鞋制作。作者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细致入微地介绍每项手艺人的一生,以及艺人的真实生活状态。这些“小人物”中,从事古籍修复的王军给梅

静留下的印象最深:“房子老旧,冬天,人在屋里站一会儿,脚板就会变得冰凉。但王军在这里修书、做书,一待就是一整天,却从没说过一个‘苦’字。”

在探访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手艺人都会说这样一句话:“根不能在我们手上断了。”“每次与手艺人的对话,都仿佛一场灵魂的洗礼,让我懂得什么是心中有念,什么是秉烛前行。”梅静的感悟越积越深,并化作字里行间的浓浓温情。

这种显微镜头式的写作,让扬州2500多年的灿烂文化和精湛的手工艺,像长卷画轴一样徐徐展开,令人在游目骋心之余,更增添了对民间智慧和人文家国的挚爱之情。

暖笔触与冷思考,与很多文化类著作偏于学术味不同的是,这本书始终贯穿着一个“情”字,体现了写作者的悲悯之心和大爱情怀。在这温暖的笔触之下,作者又以深沉、冷静的基调,讲述了传统手艺人面临的困境,以及破解的途径。这就使得这部作品脱离了风花雪月式的文艺窠臼,而具有了深厚宽广的现实意义。

一方土与天下情。作者立足于扬州这方土壤,描写的扬州手艺人鲜活且极富个性。但越是地方的,才越是世界的。从扬州手艺人曾经的辉煌,到今天工业时代它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再到有识之士对它的未来所做的扶持与拯救,其他地区几乎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虽然这部作品只是一个城市的手艺人故事,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懂得,珍念延续不断的造物文脉,以及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手艺其实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保护手艺,就是滋养我们的传统文化,培育我们的民族精神。”作者的殷殷之情,流淌于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作品语言优美、内容扎实、图文并茂,做到了学术性与艺术性的有机融合。

一生一念,一物一心。每件精湛的手艺作品,都凝结着造物者的情感。每个出色的手艺人,都是一部动人的故事。手艺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而传统文脉又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保护这一文化之根,让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是我们当代人的应尽职责。

《念物记·扬州手艺人》梅静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